



■编者按:在南京雨花台功德园的红星园里,长眠着唐亮、杜平、饶子健、刘飞、刘先胜、聂凤智等百余位开国将军和老红军。他们每一个人的故事,都堪称一部壮丽的史诗,其中的篇章,既有战争年代的叱咤风云,也有和平年代的柔情大爱。《发现》周刊联合《铁军》杂志推出“红星园·将军闪耀”系列,一为您介绍将军们的传奇故事。



孙克骥(1917—2005年),出生于福建崇安县(今武夷山市)。193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,任中共闽浙赣特委委员兼统战部部长。历任新四军第三支队、挺进纵队政治部宣教科科长,苏浙军区政治部宣教科副部长等职。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中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、华东军区海军政治办公厅主任等职。新中国成立后,历任南京市公安局局长、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、广州军区公安军政治委员、总参警备部副部长、军事科学院政治部主任、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、副政委等职。曾获一级解放勋章、二级自由独立勋章、一级功勋章,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。

# 颇有鲁迅之风的儒将孙克骥



① 孙克骥夫妇将因捐赠字画获得的25万奖金悉数捐给了相关学校

③ 1939年,孙克骥在皖南新四军三支队留影

④ 1954年,孙克骥夫妇在北京公安部留影  
(本版图片翻拍、摄影快报记者 施向辉)



② 1965年,孙克骥将军全家合影(前排中为孩子们的外婆)

⑤ 孙克骥性情开朗,即便是在特殊时期遭受不公正待遇,他依旧十分乐观

⑥ 88岁的束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,哪怕是微小的细节,她都清晰地记得

## 孩提时代见识革命“火种” 文章被称“有鲁迅之风”

上世纪20年代,出身书香门第的孙克骥跟随母亲前往北京投靠姨妈,并进入师范大学附属小学读书。此时,正是军阀割据混战之际,北京作为当时的政治中心,反应尤其激烈。小小年纪的孙克骥也正处在风浪的边缘。

孙克骥的七舅是中共党员,姨妈的家就成了在京求学进步同乡的据点。他们经常聚在这里开会。每当他们来的时候,孙克骥一边喊着叔叔伯伯,一边就自动地成为“哨兵”——和姨妈在外面放哨,有人来了,就敲敲玻璃窗。

1926年3月18日,北京群众五万余人,由李大钊主持,在天安门集会抗议,要求拒绝列强的不合理要求。段祺瑞竟下令开枪,当场打死四十七人,这其中就包括经常来孙克骥姨妈家开会的两位叔叔。另一位常来的吴叔叔受了伤,浑身是血地跑到家里来换衣服以躲避追捕。而北京师范大学一位名叫范士荣的学生,也在此惨案中牺牲。师大礼堂展览了他

的血衣,出丧时,师大、附中、附小的学生都排队为他送行。10岁的孙克骥站在队伍中间,似懂非懂地看着眼前的一切,犹如看到一颗正在燃烧的火种。

孙克骥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接受了正规的教育,这为他参加革命担任宣传工作奠定了一定的条件。他酷爱写文章,笔耕不辍,在革命年代里,用文章来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,文风老到,谈问题一针见血,曾担任我国第三任外交部部长的姬鹏飞总说:“孙能写文章,颇有鲁迅之风。”

不过,孙克骥可不单单“纸上谈兵”,解放前夕,他深入敌后,成功策反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起义,已经成为地下工作的经典。

## 一波三折深入虎穴,成功策反林遵起义

1949年2月,淮海战役结束后不久,孙克骥接到一个新任务——策反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。之所以成为策反林遵的最佳人选,是因为孙克骥和林遵同是福建人,可利用同乡关系进行工作;在抗日战争以前,曾在白区工作过,有白区工作经验;有部队工作经验,可以在政治上、军事上协助林遵组织起义。

按照同林遵的商定,我方人员到镇江后,无论谁同林遵接头,一律化名李治平、以林遵同乡、少年好友的名义,写一封信,到镇江迎江路82号找林遵,就可以接上头。

到镇江后,孙克骥和联络人员按原定地点去找林遵,迎江路很快就找到了,但是却根本找不到82号。怎么办?他俩走进一家饭店吃饭,看到了当天的报纸,头条新闻是:“丁治磐主席与林遵司令联袂赴前线巡视沿江防务。”林遵不在镇江!

几天之后,从报上得到林遵回到镇江的消息,孙克骥赶到海军码头,码头上有几个国民党兵用福建话闲聊。孙克骥凑上去同他们拉同乡关系。他们问孙克骥找谁,孙克骥说想找林遵司令谋个差事。他们说:“你等等,过会儿交通艇来,你乘交通艇去,林司令在惠安舰上。”

交通艇把孙克骥送上惠安舰,出来接待孙克骥的是一位少校军官。孙克骥把以

李治平名义写的一封信交他转达林遵。

等了好一会,有人出来对孙克骥说:“林司令说,不认识李治平,很对不起,他不能见你。”随即叫交通艇送孙克骥上岸。

后来才知道,林遵的身边有蒋介石的耳目桂永清,桂永清又安插了有许多人在林遵身边,见了李治平的信,林遵怕有不测,又不便解释,所以才礼送孙克骥下舰。

如何才能与林遵具体商量起义之事?这时,孙克骥想到了久未联系的姑表兄邵仑。邵仑和林遵一样,曾留学英国,如今是中校舰长,与林遵私交密切。孙克骥找到邵仑,经过长谈,邵仑决定在中间穿针引线。经过邵仑间接同林遵商谈,结果是:林遵起义的时机选择在我军渡江之时,起义时,我方军事代表可以上舰来,协助组织起义。

按照协议,孙克骥决定留在邵仑的舰上,一旦起义,就可以随时登上惠安号,协助林遵。但在邵仑舰上住了两晚后,4月20日,孙克骥引起了桂永清耳目的怀疑和盘问。孙克骥不得不于当天离开南京,前往上海。第二天,渡江战役打响。4月23日,林遵在南京宣布起义。

“以往部队起义都要加入战斗,但林遵之前提出了起义的一个条件,就是渡江之时,他的舰队靠边不参加战斗。我方接受了这个条件。”束颖说到了这样一个细节。

## 工作繁忙无法顾及 俩孩子随外婆辗转各地九死一生

束颖认识孙克骥的时候,刚刚18岁。那是1941年,孙克骥成为新四军一师一旅政治部的宣传科科长,而束颖是政治部服务团的团员。在工作中,两颗年轻火热的心在慢慢靠近,两年之后,爱情水到渠成,他俩结为伉俪,从此同生死共患难,相伴一生。

“孙克骥是个心思很细腻的人,我的老母亲对此深有感触。”束颖拿起丈夫的照片,细细地端详了一下,告诉记者,有一次,孙克骥给岳母送鸡汤,见汤里的油太重,怕不常吃荤的岳母肠胃不好消化,就用草纸将上面的那层浮油刮了去。

婚后第二年,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世了。“为人父母了,才知道对子女安危的担忧与恐惧远远高于自己面对战争。克骥和我都是在部队搞政治工作,经常跟着部队辗转各地,无暇照顾孩子,我的老母亲就承担了全部责任。愧疚啊,对孩子,对老人。”束颖感慨万千。她介绍说,战争年代,部队要打仗,不得不将家属和孩子留在群众家里,当时称作“打埋伏”。有一次,日本鬼子大扫荡,当地群众就将她们祖孙俩送到离村子很远的草垛里躲起来,隔着几天给她送点吃的。要知道,那时的战斗很残酷,

有的女同志背着孩子过封锁线,怕孩子哭叫暴露了行踪,不得不将孩子包裹得严严实实的,等过了封锁线要给孩子喂奶时,才发现孩子已经闷死了。“当时就想,我们那孩子怕也是活不成了。伤心啊,我和克骥难过啊。”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了,孙克骥夫妇回到了原驻地,惊喜地发现,孩子不仅活着,而且牙牙学语了。

这一年,束颖和孙克骥的第二个孩子也出世了。又一年后,解放战争开始了。此时的国民党军队,对新四军的家属都惨无人道地加以杀害。因此,部队决定将家属都撤往山东解放区。束颖那缠过小脚的老母亲就带着只有三岁和两岁的俩孩子,跋山涉水,到了山东。谁知,刚到山东,国民党的部队又跟过去了,她们只好漂洋过海地撤到东北辽东半岛,但又赶上国民党军队向丰满地区大举进攻,她们又不得不撤往长白山区。“长白山区气温长期在摄氏零下30多度,许多年轻的护送战士都冻饿而死,我那一老两小的亲人啊,怎么能扛得住?那时,音讯全无啊,我们两口子心都空了啊,好几批人出去找都无功而返。”两年了,得不到老人和孩子的任何消息,就在孙克骥夫妇绝望时,1948年,老太太竟带着两个孩子辗转返回了部队。

“两个孩子哦,一头一脸的冻疮,我家老大至今脸上都有疤痕,那是给她把脸上的冻疮挖掉时留下的。唉,九死一生啊。多亏了我那老母亲啊,她也是一个刚强的女战士啊!”

## 特殊时期乐观依旧 价值千万字画无偿捐赠国家

“文革时期,我们都成了‘革命对象’,克骥和我都被隔离审查,我们不能相见,我只知道他在不断地被批斗,扣在他头上的帽子越来越多。后来才知道他受了许多罪。”束颖回忆说,被关押的时间里,孙克骥每天干繁重的体力活,还经常被看管人员故意刁难。一次,看管人员故意赶着牛追他,牛角顶到他的腿上,鲜血淋漓。还有一次,一锅稀饭将他腿上的皮都烫掉了,也被禁止医治。就是在那样的岁月里,孙克骥一有时间就学习,做读书卡片。他的女儿孙聿回忆说,子女们每次去探望被隔离的父亲,都会带上父亲爱看的书。父亲的脸上看不到一丝愁容,十分乐观,那低矮阴暗的隔离室里常常传出父亲爽朗的笑声。而这些,则

消除了孩子们被沦为黑帮子女而对今后命运产生的恐惧,在精神上支撑着他们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日子。

孙克骥博览群书,尤其喜欢历史和文学,并酷爱字画。“我们一大家子上街,都是兵分两路。我和孩子逛商场,他自个儿去书店买书。”而家里的字画,一部分是家世传承,一部分是自己收藏。2002年,孙克骥将自己一生珍藏的董其昌、郑板桥、吴昌硕、沙孟海、舒同等共88幅价值上千万元的名人字画,全部无偿捐给了福建省美术馆。“克骥告诉孩子们,这些字画带不走,但也不能留给你们,它属于国家,把它们捐给国家是最好的办法。”福建省美术馆为此奖励孙克骥25万元,他将全部捐给了学校,分文不留。